

2003—2004

上海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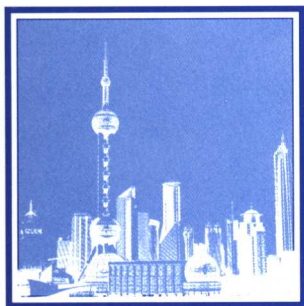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2004

上海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



主 编 杨建文

副主编 周冯琦 韩汉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金融发展报告:2003~2004/杨建文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5409-6

I. 上... II. 杨... III. 金融事业-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上海市-2003~2004 IV. F83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561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装帧 傅惟本

上海金融发展报告(2003~200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75 插页 1 字数 177,000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409-6/F·1214

定价 23.00 元

目 录

总论 国际金融中心不是梦	1
一、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足	1
二、模式选择和路径选择	4
三、发展理念和发展信心	9
四、战略机遇和战略突破	14
五、协调关系和抓住重点	19
六、金融开放和金融发展	23
第一章 2003 年上海金融运行和改革的总体分析	29
一、2003 年上海金融的发展特点	29
二、2003 年上海金融的行业特点	31
第二章 2004 年上海金融运行和改革的总体分析	38
一、宏观调控与金融发展	38
二、宏观调控下的上海金融发展	42
三、谋求新的突破	47
第三章 上海银行业	55
一、监管体制改革对上海银行业发展的影响	55
二、上海银行业发展的现状	58
三、上海银行业发展的矛盾焦点	63
四、上海银行业的发展展望	70
第四章 上海证券市场	74
一、价值投资的理性回归和股权割裂的结构矛盾	74
二、生存中求发展的证券业	78
三、日趋加快的开放进程	82
四、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	85
第五章 上海期货市场	89

一、上海期市成交金额急剧上升	89
二、上海铜市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91
三、上海胶市迈向国际定价中心	92
四、上海期铝初显潜力品种风范	94
五、上海期市一线监管规范到位	95
六、上海期货市场发展的新机遇	97
第六章 上海保险市场	99
一、上海保险业发展现状	99
二、上海保险业的新领域:企业年金市场	103
三、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	108
第七章 上海外汇市场	113
一、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113
二、2003 年外汇市场的交易状况	115
三、2003 年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	119
四、2004 年上半年外汇市场的交易状况	121
五、我国外汇市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22
六、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展望	123
第八章 上海信托业	127
一、信托制度的积极作用	127
二、上海信托投资的监管	130
三、信托业发展的矛盾焦点	131
后 记	137

总论 国际金融中心不是梦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正式提出于 1992 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当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确定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目标的时候,多少上海人为之鼓舞,多少中国人对之期盼。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金融中心是当代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地。中国立志要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洗刷百年耻辱,完成民族大业,迫切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迫切需要一个竞争战略高地的支撑。能够身负这一历史重任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如北京,如深圳,如上海,都是中华骄子、城市精英。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卫先锋,在中国新世纪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历史职责和民族嘱托。

胡锦涛总书记 2004 年 7 月下旬考察上海时,希望上海的同志继续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温家宝总理 2003 年 8 月考察上海时也强调,上海应该充分发挥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努力创新,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一定加倍努力,把上海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建成“一都市(国际大都市)、四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一、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足

在论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时,人们经常会提到,上海曾经是我国近代银行业的发祥地,它的金融发展史可以追溯到 150 多年以前。据史料记载,上海开埠前没有银行,资金流通以钱庄为主要载体。1847 年英资东方银行首先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后来德国、日

本、俄国、法国、美国等国的银行相继在上海设立了金融机构,1936年上海的外资银行已经达到了29家。1927至1937年期间是上海金融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既有货币市场,也有资本市场;既有内汇市场,也有外汇市场;既有黄金市场,也有白银市场,并且成为全国货币发行和货币流通的枢纽,对全国的金融业产生极强的辐射作用,成为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的背景下,在全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内涵已经完全不同,而且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众所周知,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上海曾经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包括金融保险业在内的第三产业严重萎缩,在产业体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当中央政府批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必须改变。因此,第三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随即得到迅猛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随即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证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金属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粮油交易所等要素市场,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傲视浦江两岸,奠定了上海日后崛起的发展平台。

然而,对于上海来讲,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业超常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发展,是一种后发性的发展,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特殊性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底气还不很足,发展的空间还不很大。用我们的话来概括,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障碍,又受到了“后天不足”的约束。这种不足实际上随后就开始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所谓先天不足,主要是指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央银行不在上海,四大商业银行的总部不在上海,金融政策的制定部门不在上海,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不在上海。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学者鼓吹过“华盛顿-纽约”模式,但至少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正是由于这四个“不在”,客观上已经决定了可供上海金融自行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从理论上讲,如果先天不足,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但是问题就在于,上海金融发展的后天条件同样也是不足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后天不足,主要是指1992年中央确定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后不久,1993年和1994年就在全中国范围开始了以整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直接通过银行控制信贷规模,通过信贷规模控制投资规模,通过投资规模控制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方式是正确和有效的,但是在客观上对地方金融的发展空间形成了约束。宏观调控刚见成效,我国就遇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规避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的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中央政府紧急提出了重点防范金融

风险的任务,并要求上海着力建立金融安全区。从理论上讲,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任何金融创新都有风险,关键是看风险的承受能力和转化能力。当我们承受金融风险能力很弱的时候,推进金融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很小。而一个地方如若不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创新活动,要想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思议的。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大事件,十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在这一期间,尽管上海一直孜孜以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实现,并为之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例如,我们在“九五”规划时期就将金融保险业列为上海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十五”规划中仍然将之作为产业支柱。又如,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率先实施了外资银行的本币业务试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率先试行了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但是,在现行的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条件下,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约束下,有许多事情是可言之而不可为之,也有许多事情是可为之而不可言之。实际上,我们该拿的都拿了,该做的也都做了。在外部条件和发展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任何主观努力都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结果。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如果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这一状况,就会导致某种无可奈何情绪的出现,以及某种无所作为情绪的增长。

统计资料详细地记载了这一过程:

(1) 从绝对数值上看,上海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同时也是极其不稳定的。金融业实现的增加值从1990年的71亿元,上升到1995年的245亿元和2000年的685亿元,随后又回落到2001年的620亿元和2002年的585亿元,2003年略有回升,达到629亿元,2004年再度下降。尽管上海金融业实现的增加值在全国各省市中排位第一,但是波动幅度明显过大。

(2) 从相对比重来看,上海金融保险业发展的不稳定性或波动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它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①从1990年的14.8%,下降到1995年的3.7%,再上升到2000年的21.5%,再回落到2002年的0.3%。与此相应,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45.9%,下降到1995年的43.8%,再上升到2000年的57.0%,再回落到2002年的46.9%和2003年的33.5%。

(3) 如果从增长的角度来看,上海金融保险业发展与上海整体经济发展同样非常不协调。2001年上海金融保险业的增长率出现了2.1%的低潮,与全市10.2%的两位数平均增长速度相差甚远。2002年甚至进一步出现了零增长率(0.1%)。即使2003年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达到了7.6%,但是仍然低于第三产业的增长率(8%)和全市GDP的平均增长速度(10.1%)。连续几年的增长率低于全市GDP增长率,使金融保险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由2000年的16.7%逐步下降到了2003年的10.1%。尽管我们还是可以大言不惭地讲,

^① 根据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上海金融保险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已经连续 10 年超过了 10%，但是与“十五”规划中提出的上海金融保险业比重要达到 18% 的要求相去甚远。

如此复杂的形势，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此艰巨的任务，不能不令人夜不能寐，思虑万分。如究其原因，固然存有多种，证券市场的整顿调整和长期低迷无疑是一个直接的首要原因，但这个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不取决于上海；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是一个深层的根本原因，对此还得顾及全国大局和国家战略。

上海金融面临着“转型前的阵痛”，面临着“十字路口前的选择”。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特定的发展环境里，上海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何才能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质性地推进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这一系列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 1 600 万上海人民的面前，也摆在了 13 亿中国人民的面前。

二、模式选择和路径选择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含三层具体的含义：一是金融产品交易和资金集散中心，二是金融产品定价中心，三是金融信息中心。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高度发达，以及金融机构密集、金融市场完善、资金交易活跃、金融工具齐全、金融信息灵敏、金融设施先进、金融服务高效、辐射能力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

（一）我们应该选择哪种模式？

当前，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和运行方式并非是完全划一的。归纳地讲，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

1. 外资外向型金融中心模式

这类模式以英国伦敦为主要的代表，在当今世界三大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东京）中，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可以算是最高的。它在国外股票交易、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外汇市场交易、航空和海运保险净收入以及跨境银行借贷额等方面，均位居世界的第一位。

2. 国际国内并重型金融中心模式

这类模式以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为代表。与外资外向型模式不同的是，这类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是国际国内两个资本市场并重。国内的经济发展是依托，是基础，是根本，

大多数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内经济发展相联系。正是因为这类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草根”特征,所以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功能相对而言较弱。例如,纽约尽管是国际大都会,但是它只有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所内交易量居世界第一位,而场外交易量就远不如伦敦了。

3. 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

这类模式有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亚洲的新加坡、巴林、香港;北美的洛杉矶、多伦多等。这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量,所占的全球比重一般不超过 10%,国际化程度与前两类全球性或世界级金融中心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债券发行都非常有限,证券市场上的外国公司也不多。到 2003 年 2 月底,香港证券市场上的外国公司数量仅为 9 家,新加坡为 63 家。

此外,实际上还有一种纯粹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记账服务的金融中心,包括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巴巴多斯、安圭拉、维尔京群岛、安的列斯群岛、波多黎各等。这类金融中心一般没有金融管制,也不发生实际的金融活动。但具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和税收优惠,对各种资产和收入几乎不征税或征很少的税,只要交纳少数管理费即可开业,所以各类金融机构多是“空壳机构”。

由此可见,尽管世界上不少城市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各自的功能定位和运行方式并不完全相同。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因人而异,“异”字中也有可能夹杂着某种主观的偏好和意愿,但是,任何主观选择都受到客观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影响,任何主观愿望都必须具备客观基础和客观可能。因此,这个问题提出后的进一步延伸,也就把我们的思考引向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动因和动力究竟是什么?基础和条件究竟在哪里?特点和差异究竟如何体现?

为此,我们还是先考察一下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基础和形成过程。无论是伦敦、纽约、东京,还是新加坡、香港、法兰克福,它们的发展条件、发展动因和发展历史是各不相同的。有的金融中心是在数百年市场经济逐渐发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也有的金融中心则是在较短时期里通过政府强力推动跨越发展的。但是,无论哪一种金融中心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一系列基本的前提条件。例如,需要拥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旺盛的资金需求,需要拥有有机的市场体系和有效的市场监管,需要拥有技术的支撑平台和人才的吸引机制。具体地讲,如果没有战后欧洲复兴对美元的巨大需求,战后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成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对外物流和资金流的唯一通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没有 20 世纪 60 年代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和跨国公司在亚洲经营业务的大力拓展,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也会缺乏现实的基础和客观的可能。

即使成为国际金融活动的枢纽点以后,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了区域范围内或全球范围内的资金资源配置功能,但是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发展趋势还是在运营效率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方面,实际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类似伦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比较稳妥,波动起伏不大,甚至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还进一步完善了它的功能;类似东京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则由于内部发展条件(如国内经济由盛而衰)和外部发展环境(如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的变化,而导致功能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逐渐走向衰落的迹象;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充分利用世纪之交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大洗牌”的机会,悄悄地从区域性金融中心转向全球性中心,现在正在努力克服这个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上海在谋求国际金融中心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重要的,发展路径的考虑和发展战略的确定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或者任何一个举措的失误,都有可能導致发展方向的偏差和发展目标的失落。尤其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承受不了任何折腾和差错。在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确实必须认真考虑一下目标模式的选择和演化路径的安排问题。

根据我们的看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目标模式应该是全球性的,是综合性的。那是因为,中国有 10 多亿人口,占全球人口总量的 22%,将近达到四分之一的比重,因此,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当代人类发展进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发展标志。当 21 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中国的经济事务与全球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将会很高,外在影响将会很大,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因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上海如若能够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它的辐射圈或覆盖面也将与中国经济的辐射度或覆盖面相适应,类型必然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并重的。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后者是本,是根,是基础;中国的发展必然以全球为舞台,中国的发展必然与全人类的发展相协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就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和“全球一盘棋”上的一个“眼”。这是发展的逻辑,也是必然的选择。

反过来讲,占据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比重的中国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撑,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一个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兴起。当代中国如若没有我们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那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构成中或者在全球利益链的分配中,将始终处在低端地位或末梢地位。这种局面如果长此下去,那么,不仅中国人作为“世界民工”的地位无法改变,而且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也会大受影响。所以,上海要在建设资金的需求与供给结合的基础上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决不是短期的考虑,也不是局部的设想,而关系到中国经济长久发展

之大计和全球竞争之大局。

(二) 我们应该选择哪条路径?

最终目标的确定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的努力和奋斗需要有一个方向。然而,最终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不断演进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设定一些阶段性的发展目标。我们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大致上分成两个发展阶段,中间的时段节点可以设定在2020年,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完成之时。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上海的发展目标应该选择国内金融中心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特殊阶段又可具体分为三步走,即在2005年前奠定好基础、在2010年前构建好框架、在2020年前实现初步建成^①。

为了能够在2020年实现阶段性发展目标,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发展的有效路径应该是:以制度创新和政策促进为主要推动,以国内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长江三角洲跨越式的经济发展)为主要依托,以金融体系、金融机构、金融制度的三位一体为主要抓手,以外资经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的联动发展为主要基础,以融入全国、服务全国、走向世界为主要功能和主要任务。

之所以如此定位,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政府的作用和功能也是非常特殊的。那是因为,(1)如果没有跨越式的发展,那就不可能有后来者的崛起。如果没有政府的第一推动力,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2)经济的跨越发展与体制的不断变革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的矛盾摩擦,有的时候这种矛盾摩擦会以激烈的或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现在之所以强调要以协调发展为主线,不仅因为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系统性和制度性的不协调,而且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时还在不间断地再生产出不协调。因此,政府的有效协调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推动,没有相关部门和相关政策的积极支持,没有兄弟省市和周边地区的积极配合,是绝对不可能有效推进和取得成功的。

第二,任何一个金融中心都是金融体系、金融机构、金融制度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体。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金融长期扮演“侍女”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

^① 在2004年形成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中,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重点有了细化和深化。总体思路是“五年打好基础,十年初见成效,二十年基本建成”。也就是到2005年创造基础性的条件,形成一个较为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和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到2010年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系发展又严重滞后,等到需要“灵魂”发挥作用的时候,无论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还是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无论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还是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都严重地不相适应。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打好,把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搭好。

近十多年来,上海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积极推动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市场体系支撑的运作平台,初步形成了一个由市场制度支撑的运行机制;接下来应该做的工作就是使这个运作平台更大一些,内在联系更紧一些,使这个运行机制更活一些,配置功能更有效一些。这也就是说,我们在现阶段应该促使“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有机结合。政府的政策推动既要保持足够的动力,又要把握正确的方向,还不能错过发展的时机;市场的运作机制既要保持足够的活力,又要具有创新的压力,还不能丧失自控的能力。

第三,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全面整体发展,以及外资经济的大规模进入、民营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国有经济的深层次改革,既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供给,也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旺盛的资金需求。这样,就使上海初步具备了建设资金需求拉动与建设资金供给推动结合型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同时,也给上海设定了必须以国内发展为基础,以服务全国发展为任务的基本格调。

作为一个以国内发展为主要支撑点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广阔的经济延伸腹地 and 金融辐射空间,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提出了“西部开发、东部发展、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全方位大发展的战略大思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发展需要,而且增强了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加快了融入国际化潮流的步伐,跨国公司的“引进来”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互相促进,互动融合,进一步增强了对国际金融中心有效服务金融功能的现实需求。

第四,尽管需求客观存在,而且非常迫切,但是现阶段满足需求的供给条件却不是很理想。这也就是说,上海目前还缺少有效成为资金供给推动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性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

伦敦当初有充足的欧洲美元存在作为支撑,新加坡后来有充足的亚洲美元存在作为支撑,而巴林则有充足的石油美元作为基础和依靠。那么上海呢?上海目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外汇资金主要来源于周边国家外汇储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由于在外汇储备管理中,安全性、保密性是第一位的。在上海金融制度没有真正完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没有真正完备,人民币没有能够自由兑换,以及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国际化和市场化之前,特别是存在严格外汇管制的条件下,指望周边国家外汇储备大量进入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包括东京这样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也包括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它们不仅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国际化程度都非常的高。例如,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银团贷款中心,成为世界四大黄金交易市场,黄金年交易量达250万—300万盎司。

司;新加坡目前已经成为最大的亚洲美元市场;东京是世界三大主要资本市场之一,日外汇交易额已经达到1600多亿美元以上。上海在短时间内确实难以同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国际资金供给和国际资本市场,至少技术条件和资金条件就不具备,更深一个层次,相关的制度条件和政策条件也不具备。

第五,就当前而言,上海最为现实的发展机遇,就是借助20世纪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趋势,做好为“世界工厂”服务这篇大文章。这不仅是现阶段我们“融入全国”和“服务全国”的主要内容或具体内涵,而且也是为上海进一步“面向世界”和“走向世界”提供了练兵机会或前期准备。

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和投资意愿的进一步扩大,投资项目和投资企业的数目在不断增加,进而在上海对其投资在华企业的资金进行统筹管理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迫切。近现代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显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以及“世界工厂”的形成和转移过程中,只要能够按照国际经济运行的规则和惯例办事,能够有效地服务于这个进程,就有可能奠定国际经济中心的发展基础,并且拓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

上海生逢其时,身处其地,通过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工厂”发展提供服务,做好服务,就一定能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好条件。因此,根据我们的观点,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完全应该(而且只能)定位于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以服务全国为己任,以服务跨国公司为契机。在此基础上,再逐渐积聚能量,提升实力,创新制度,进而面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是较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三、发展理念和发展信心

困难和约束需要正视,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信心和决心同样需要树立。这句话适用所有场合,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为如此。2002年8月5日上海前所未有地召开了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良宇明确提出了用三年时间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阶段性目标^①。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市委书记陈良宇、市长韩正等市领导多次就建设国

^① “十五”期末上海争取实现“四个基本确立”:(1)上海要在2005年基本确立金融在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争取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从当时的13%左右上升到20%左右;(2)基本确立上海作为国内外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的地位,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3)基本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使上海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4)基本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包括依据中央对地方政府做好金融工作的职责要求,更好地配合国家各有关部门,加强协调、形成合力,重点抓营造金融机构集聚的市场环境、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完善货币市场功能和拓展金融市场功能。

际金融中心问题认真地进行了调研和部署。他们的前提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要牢固地坚定发展信心。

(一) 我们为什么拥有信心?

尽管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在 2002 年那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上海市政府能够提出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具体的实施步骤,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上海在当前形势下对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迫切心理和充分信心。

之所以有信心,有理念,主要建立在以下几个分析判断的基础之上:

第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的社会迅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2002 年全国实现进出口总额 6 200 多亿美元,2003 年达到 8 512 亿美元,居世界第 5 位;2002 年流入中国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总量高达 527 亿美元,2003 年 530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之最。中国活跃的经贸往来和强大的投资引力,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重要的市场机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能够提高这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可以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有效的促进和巨大的利益。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也就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逐步从国内金融中心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对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依托的国际金融中心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可以为国内企业提供中长期的国际资金融通,有利于加快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步伐,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也有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并且使我国在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掌握主动权。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理想已经不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10 年前,当上海刚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设想和目标的时候,在许多人的心中是抱有很大怀疑的,认为不大可能实现。现在,各种疑虑明显减少了,各种支持也有可能不断增加。那是因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复兴的背后,就是中国经济的强大,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就是中国人民对现代化事业的真诚期盼。

第二,中国对外全面开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创造了最有利的环境。

中国已经在 2001 年 12 月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尽管目前还处于保护期或过渡期,但是保护期是有限的,不过就是 2 至 7 年,全面开放的时间表实际上已经确定,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全面开放已经在即。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当代世界,全面开放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必须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竞争的内容是市场份额、投资机

会、资源占有,竞争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竞争的核心是抢占战略制高点。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如若没有一个现代化的资本市场提供基础性的发展平台,如若没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作支撑性的发展服务,那么,就有可能在日后竞争的关节点上经常性地受制于他人,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出现意想不到的金融风暴和发展逆转。

因此,根据我们的认识,如果说十年前的国家战略还是基于“韬光养晦”和“把自己的事做好”,那么,1992年中央希望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还是出于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基点已经移向了中国和平崛起,移向了“全面开放”和“国际竞争”。与此相应,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将更为深远,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需要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更需要国内提供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加快步伐,需要提速运行,应该争取早日建成。

综观全球,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每一个经济体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都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其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总量占了世界将近四分之一的比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将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今后,由于金融产业特殊性质的进一步显现,同时也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金融中心的体系格局将进一步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型的国际金融服务机构将逐渐向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集中,这种趋势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最终也许只会剩下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谁有机会胜出,目前还很难预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谁胜出了,谁就掌握了战略主动,就占有了战略高地。在亚洲,竞争也许就在上海、香港、东京之间进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发展起点最低,目前的发展差距最大^①,但上海的发展势头最猛,上海的发展动力也最足。那是因为,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并非只是上海的发展战略,更是全面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全球战略和国家根本利益。

第三,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重要保证。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和上述考虑,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和决策,始终得到了我国中央政府的坚决支持。早在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央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背景下,中共十四大就已经明确地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列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后来,在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增长和中央酝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国务院又一次在批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明确地要求上海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2003年8月,在我国即将全面开放和新一届中央政府积极筹划新一轮战略发展的背景

^① 若与香港比较,发展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2000年香港吸引的FDI是上海2001年的近9倍;上海外资银行和信托机构的数量是57家,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多。跨国金融机构的集聚程度是反映该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这一角度来看,上海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或者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走的路还很长,建设速度还必须加快。

下,温家宝总理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再度希望上海能够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2004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听取了上海同志工作汇报后,再次强调上海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把上海未来的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再接再厉,扎实工作,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中央政府之所以支持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多的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是从全球一盘棋的角度考虑。所谓一盘棋,讲求的是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之利,讲求的是致力于整体长远发展。北京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深圳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事论事而言,都是好事,都有基础,都有条件,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将北京、深圳和上海都放到全国一盘棋或全球一盘棋中来考虑,那么,我们的视角和观点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北京、深圳和上海,无论哪一家都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整体安排,都必须服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对于上海而言,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内在动力。

上海经济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发展,经过了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目前已经在经济转型方面实现了一个大飞跃。尤其是产业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2003年超过了5000美元。根据发展规划,2007年上海还将达到人均8000美元的发展水平。这就同新加坡和我国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台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发展水平差不多。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式计算,上海目前的发展实力和发展水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当年发展状况。

(二) 我们拥有什么条件?

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加上特殊的开放背景,促使上海近年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非常活跃,进而产生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强大需求和坚实支撑。

首先,上海的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很快,2002年实现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727亿美元^①,原计划2005年突破1000亿美元,结果2003年就达到了1124亿美元。如果按照上海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计,2002年为1425亿美元,2003年为2014亿美元。物流带动资金流,贸易促进金融业。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需要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在我国2004年

^① 上海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2002年相当于GDP总值的111.1%,2003年上升为148.8%;外贸出口2002年相当于GDP总值的49.0%,2003年达到64.2%。